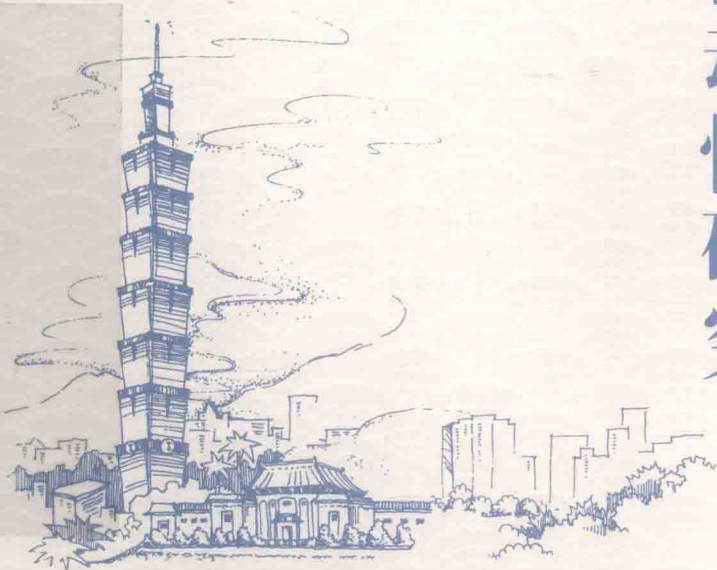


台湾研究新跨越

HaiXiaLiangAn JingJi Zhouqi XieDongXing YanJiu

海峡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

● 王 华 著



海峡两岸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王 华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两岸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王华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12
(台湾研究新跨越)

ISBN 978-7-5615-4735-9

I. ①海… II. ①王… III. ①海峡两岸-经济周期分析 IV. ①F1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2844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总编办电话: 0592-2182177 传真: 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 0592-2184458 传真: 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xmupress.com

厦门大嘉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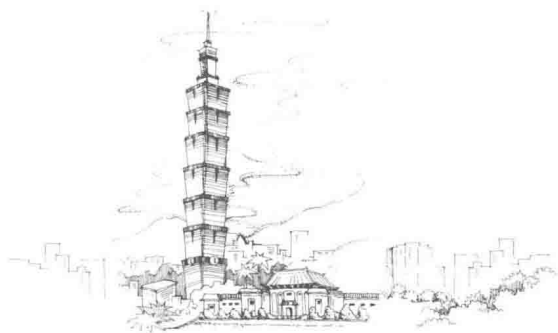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 × 970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45 千字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台 湾 研 究 新 跨 越

项目资助：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依存与经济周期协调性研究：以两岸经济关系为例”（09BJL057）

（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动态理论与微观基础”（2013221020）

（3）2013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自序

——再论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的范式方法 暨实用主义经济学批判

一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全国各地、各界普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学术界也不外其中。笔者无知无畏,意图对中国大陆涉台经济研究的文献成果加以梳理,从中勾勒出该领域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遂将相关资料整理成文,以《台湾经济研究三十年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演进》(以下简称“《三十年》”)为题,提交于由福建省社科联与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的“台湾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做修改后发表于《台湾研究集刊》。现在看来,该文中的很多论述都有失严谨,尤其是对于“范式”一词的理解偏离其本义,用之太过随意了;^①然而或为敝帚自珍之故,笔者仍自觉可以从中找到诸多“真理”的成分。

在《三十年》一文中指出,涉台经济研究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演进,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历程具有较为明显的关联性特征。随着两岸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深化,涉台经济研究的内容由初期的政策法规介绍、现状描述和制度评价,逐渐过渡到后期的问题剖析、趋势预测和机制构建等方面;而研究方法则由以(基于可获取的统计数据对经济现象的历史发展进程、水平和结构所进行的)数量描述分析和(根据前人研究论述和其他文献资料提炼出逻辑自治、结构完整的观点体系的)文献归纳为主,发展到(基于特定经济理论进行推理演绎和类比的)逻辑推理和(对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证伪的)计量模型的广泛运用。同时,各类研究方法又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以逻辑推理方法为例,该方法的运用需假设作为逻辑前提的特定理论

^① 文中所谓“研究范式”,实际更加接近于“研究路径”的意涵。

是合理的、适用的,但本身却无法验证这一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情况(即特定理论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可能恰恰是不适用的,可理解为逻辑前提的有限论域);符合逻辑的推理路径往往是多样化的(这也与选择不同的逻辑前提/经济理论有关),在由其产生的各种推论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是矛盾之处(即不能满足推理分析的内洽性),对于冲突乃至互斥性推论的取舍问题,在该方法的框架内也无法予以解决。有鉴于此,文中主张在各类研究之间建立必要的传承机制,以使基于不同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彼此可以相互参照,并由此不断推进涉台经济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时隔五年,两岸经贸关系已经日益趋向正常化,发展成果斐然;围绕两岸经贸关系的研究更成为两岸领域的“显学”,热点议题层出不穷(如海西区规划、ECFA 签署、自由经贸区设立等),关注与讨论者颇众。如今重拾研究方法议题,《三十年》中所勾画的研究脉络依然稳健延续,但本领域研究的方法论缺陷却也更加彰显。在针对两岸经贸关系的研究中,不论是对重要经济现象(如两岸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原因、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后果所进行的解释与预测,还是针对两岸经济合作各层面的机制构建和路径规划,都极为倚重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但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却也因而难以避免。该领域研究通常是基于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经典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产业梯度理论、投资区位理论等)在两岸论域中展开演绎,然而对于相关结论是否确然成立、是否与客观相符,对策建议是否一定会取得预期成效,却往往疏于严谨论证和审慎检验。《三十年》中亦有提及,经济对策的得出应具备合理性(符合理论逻辑)、可行性(满足现实条件约束)以及有效性(既有条件约束下的效果最大化)等三项条件,而现有文献则大多仅关注对策建议的直观合理性而忽略对其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考量,导致研究结论易于失之空泛、大而无当。即便如此,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两岸经贸关系研究仍然遵循其既定的范式方法向前发展,并未出现笔者所预期的各类研究前后传承、相互参照的明晰图景。

笔者的知识结构偏重于经济研究的定量方法,为避免受到诸如“马斯洛的锤子”^①之类心理倾向的潜在影响,使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出现偏差,故常自律以避免夸大计量经济学等定量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功能价值的不可或缺

^①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著作《科学心理学》(1966)中提到:“如果你手里握有一把锤子,那么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一枚钉子。”此种心理倾向被命名为“工具法则”(the law of the instrument),也可理解为工具本位主义,概指要求研究对象适应于研究方法而非相反。

性,但此间仍不得不强调根据经验事实对相关逻辑推论(包括对策主张)加以系统检验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在两岸经贸关系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演绎而轻归纳”的方法论取向;即使客观事实信息从不稀缺,但对于这些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却往往显得过于草率,演绎过程的逻辑精度远远不足。不仅如此,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派生出日益明确而迫切的制度安排需求,这也促使相关研究在议题选择和内容组织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重经验而轻理论”、“重评价而轻论证”的倾向。若以经济学研究方法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二分法衡量,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目前在规范分析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实证分析却始终步履蹒跚、难以随行。诚然,这种倾向的产生有其现实必然性,但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若不能从大量释出问题的两岸经济关系论域发掘出具有稳定性、特异性的客观规律(理论体系),不能从对策规划的构建过程中提炼出可供重复操作的实践模式,终究表明两岸经贸关系研究还缺乏学科发展所应有的成熟度;由此以学术之名而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将难免失准。

之所以在两岸经贸关系研究领域一直存在对理论研究的忽视,以笔者之见,其中的一项关键原因即在于国内实用主义思想的大行其道。

二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成熟的哲学思想体系,产生于西方世界;而作为一种深植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在中国却有着更为久远的发展源流。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一句“学以致用”,便足可将实用主义的关键影响完全涵盖其中。从儒家推崇的由“格物”、“致知”而最终“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墨家主张的“尚用”、“非乐”,到唐宋时期古文运动提倡的“文以载道”,再到科举制度所昭示天下的“学而优则仕”,实用主义都得到极大体现,甚至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不为过。^①而经济学之“经济”一词,其“经”有“从事、治理”之义,“济”有“帮助、成就”之义,经典用法包括“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等;英文 economics 的中文译法,从最初的“富国策”、“理财学”、“资生学”、“(生)计学”等,到最终被确定为“经济学”,足见其所被赋予的深切的实用主义希求。与名称相仿,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同样是针对资源、民生等现实问题,旨在寻求社会

^① 有趣的是,“格致”二字恰恰是关于 science 的最初中文译法,鲜明地反映了当初译者以治世为本、以科学为用的学术价值观。

实践中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如是观之,实用主义学术观恰恰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意识,成为反对“徒讲义理、不揣时势”、“坐而论道”而“玄学空谈”的最有力宗旨。那么其究竟何过之有,以至于要横加批判?

在一篇讨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经济学家(者)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人文素质较弱、读书最少的一个群体。^①姑且不论此言是否成立,至少就笔者自己的求知路径来看,读书之少不容否认;对于“主义”和“批判”这样的深邃议题,自知实难轻易驾驭。然于末学后进之路,常为相关意念的冲突所困扰,思虑至今,不期然间“批判”一念跃入脑中,便再也挥之不去,故索性纵之积蓄、立言成形。笔者无意对“实用主义”这一外来术语的哲学本义及其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的含义演化过程做更深入探讨,只以今天国人的大体共识,将其解读为一种以预定目标(的实现与否)来评价行为和手段的合宜性,或曰“重结果而轻过程”的价值标准。如前所述,这一标准当然有其积极价值所在;然而,以其对于国人行为的作用机制和对于预定目标的促成效果来看,负面作用甚巨,长久以来便为人诟病不已。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体系最为严整、研究方法最为规范的一门显学,经济学研究中实用主义的盛行,其弊端同样不容忽视,这大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实用主义评价标准的相对性。

由谁来评定学术研究(甚至于任何人类活动)的“有用”与否?这是由实用主义出发首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将“用”指向天下大义、世人福祉,但在现实中却难以成立。须知现实世界中的利益格局具有长期而绝对的不均衡性,任何事物或活动,对于某些人有用甚至有大用,而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无用甚至有害;在某一时、某一域有用甚至有大用,而在另一时、另一域却可能无用甚至有害;对短时和局部有用甚至有大用,而对长期和整体却可能无用甚至有害。由此可见,“有用”与否,端视评语出于何人之口。不难理解,在任何时空环境下,掌握话语权者都会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来设定“用”的标准,^②而掌握资源配置权者又会相应掌握评定“有用”与否的话语权。因此,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有用”标准,实用主义在不同的利益格局下必然会产生不同

① 蔡昉:“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发表于《读书》1999年第6期。

② 这与道德标准的形成颇有类似之处;或者可以认为,实用主义本身就是道德标准的一个评判维度。

的价值导向。

就今天国内的学术环境而言,行政化的力量所及,学界对于学术评价的话语权旋即拱手相让;一百多年前西学东渐过程中仿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高校科学研究体制,逐渐与中国历代的“文官加谋士”体制建立起微妙的对应关系。一方面,政府部门针对学术研究体系设置了系统的研究资助和成果奖励制度,根据施政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研究选题、释放财政经费,并在成果奖励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引导学术研究在既定周期内(通常为一到三年)产出制度设计和社会继续所需的知识成果。另一方面,高校单位也相应建立了以政府资助和奖励为依据的、“等级森严”的考核制度,根据学者所获得资助和奖励的行政级别来判定其工作成就的水平高低并决定其专业职级的晋升与否。当财政的“胡萝卜”与考核的“大棒”遥相呼应、俨成一体时,由行政官僚体系(的施政目标)对于学术研究给予价值认定已然成为“想当然耳”的事。不唯如是,企业、媒体也都因各自的知识需求(更多是观点需求)而加重了实用主义评价体系的砝码。

当中国高校的经济学者所面临的外部主体,大量释放需求信息并许以充足研究经费,一力要求其“言当有用”、“论必务实”时,经济学学科似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受到了举世不二的社会尊崇,经济学者们也大有“指点江山”的“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政府行为常常表现出短期性和部门(地域)本位倾向,官员的政绩观也未必端正,急功近利者有之,唯上不唯实者有之,甚至以公徇私者亦有之;同时,媒体则只是关注于学术成果和学者论述中通俗而易起争论的部分,倾向于将学者观点加以随意延伸乃至曲解,而经济学家参与企业管理运营也鲜有成功的案例。如若完全以政府和社会需求为导引来决定学术生产的方向,极有可能是“经世”反成“乱世”,“济国”却致“误国”。名利场中淘炼一番,专家成了“砖家”,教授成了“叫兽”,反被世人视为利益集团之无良代言人而受尽讥讽,这实非学术之初衷。

第二,实用主义目标认知的有限性。

即使上文关于实用主义评价标准相对性(不一致性)的论述不能成立,假设现实中存在关于“有用性”目标的一致性评价标准,经济学研究可以避免因目标冲突而导致的无谓干扰和损耗,但此处仍然有一个问题值得存疑:学术研究的评价主体(即上文所言掌握学术资源配置权者与评价话语权者)是否有能力对实现目标的“有用”手段形成清晰认知?是否有能力准确判断特定学术研究的潜在价值?对于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对现实评价主体寄予过高期望。在所有社会系统中,资源控制能力与社会认知能力二者之间极少能达到良好

匹配状态;对于社会系统的发展方向以及学术研究为社会系统可能带来的影响贡献,以人类认知之局限性,自然也难以有太长时间跨度的预判能力。资源控制者越是拥有认知社会发展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自信,实际对于学术发展路径的负面影响会越大;而所谓的目标和手段“认知”,恰恰也将知识发展限定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对于不可预判其价值的知识创新则往往予以忽视甚至遏制。

曾几何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持有乐观信念,认为政府部门可以掌握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全部知识,可以通过精确计划来配置经济资源并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细节,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最优发展。然而现实却完全颠覆了这种乐观信念,相较于指令经济的“看得见的手”所造成的低效率,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反而更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全民经济福利的有效提升。经济如此,学术亦是如此:与其由掌握相关权力的少数派来设定学术目标、指派研究议题,不如由直接从事学术研究的多数派进行自决;虽然指令性学术研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颇具可视化效果的规模效应,但自由探索式研究却能够在长期中勾画出更为稳定的知识发展路径,此间最少浪费而最多收益。换言之,与根据有限认知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来划定学术研究路径相比,以个体求知欲为出发点的“纯粹”学术研究反而可以为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拓展出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长期社会发展。

回溯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一直以人文学科独领风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则仅仅停留在零散的经验层面,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究其原因,历朝历代当政者关注的社会发展目标都在于国家治理,儒家文人也莫不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志向,但不论当政者还是文人布衣,都没有能力认知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国家治理的远期功效;在实用主义思想支配下,国人一方面强调人文学科发展对于实现经国济世目标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则轻视甚至鄙薄自然科学研究的些许探索,“奇技淫巧”从来都难登大雅之堂,最终结果则是生成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①而由于缺乏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训练和方法论支撑,社会科学的产生也就成了难以想象的事。即使在今天,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环节,仍受到有意无意地轻视与排挤——如经济学中不

^① “李约瑟难题”的表述为:为什么(公元前1世纪到16世纪)古代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实际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经验科学与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可以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视为这一问题的现代版本。

能产生直接政策效果的纯粹数理分析,就常常被批评为自娱自乐的数学游戏。

第三,实用主义学术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奉行实用主义的经济学研究通常表现为:高度关注于对经济实践提供直观可用的对策建议,不考虑从特定经济现象中提炼出一般化的理论模式,也不关心对策工具的可移植性或曰普适性价值;而即使是对理论有所涉及,也只是对经典理论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对于特定问题领域中的既有理论,合则用,不合则直接以所谓的“常识”替代之,不关注理论的证伪、革新等与实践“无关”的环节。由于缺乏理论关怀,急于对具有特殊性的现实问题给出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但又要冠以学术之名,所谓的学术研究往往难以在学理方面抵达足够的深度和高度。当学术评价完全以“有用”为标准,而评价者对于“有用性”又仅有非专业化的要求时,学术研究的速产和高产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这种速成品固然可以观点鲜亮,但论证却必然稀疏,研究结果的获得途径不明确、可靠性也大多无从检验。受制于此,学术传承与创新都将无以为继。^①

参照产业价值链概念,笔者针对经济学研究的整个流程构造了学术价值链:其中将学术研究流程划分为事实发现—文献批判—理论建构—(量化研究)工具开发—经验证伪—对策建议共六个环节,而特定研究环节的“学术价值”则可以定义为该环节在学术传承过程中所能满足一般化特征、发挥普适性功效的程度,也可称为“学术附加值”。与产业价值链所表现出的“微笑曲线”形态恰好相反,学术价值链中处于上游的“事实发现”与处于下游的“对策建议”环节,由于缺乏一般化意义,学术附加值因而较低;^②处于中游的“理论建构”和“工具开发”环节则极具普适性价值,学术附加值因而最高;整个曲线的形态酷似哭泣的嘴形,不妨以“哭泣曲线”来命名之(如图1所示)。当经济学

① 实际上,实用主义经济学在国内还存在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即现今已在经济学界引起普遍警惕和反思的模型滥用与技术至上现象。此种表现乍看与实用主义无涉,学界批评也主要集中在对于数学技术(不论是数理分析工具还是计量检验工具)的高度依赖会对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性成分产生挤出效果;但其内核却仍然充斥着实用主义的因素,在追求形式上的精确性(从而满足对策建议的可证伪性)的同时,却疏于理论生成的完整思维过程(尤其割裂了由实践而提炼理论的科学认知进程),属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过度消费。换言之,所谓技术(模型)滥用,过不在技术本身,而恰恰是暴露了实用主义学术研究本身的“急切”之弊病。

② 如果对策建议的生成过程具备形式逻辑的结构特征,符合一般化推广的内在要求,则其可以成为进一步理论建构的新起点,可望培育更高的学术附加值。但在实用主义支配下,这一层功效极少可以满足。

科渐趋成熟时,学术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经济学家们会根据自身特点将研究精力集中于学术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而当实用主义盛行时,学术分工却会被弱化,对于实用性的追求激励研究者从事实发现直接跳跃到对策建议环节(学者们被锻造成为全能型专家),整个学术价值链遭遇体制性压缩,学术研究丧失应有厚度,学术价值则整体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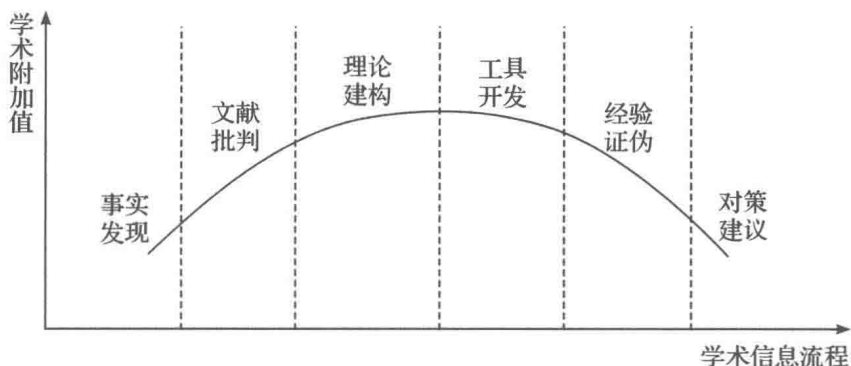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学)学术价值链与“哭泣曲线”

前文提到《大学》中所提倡的为“明明德”而需“修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法,可以很好地反映“治学”与“治世”的辩证关系。其中,为“治世”而“治学”(也即为“治国、平天下”而求“格物、致知”),与由“治学”而“治世”(即由“格物、致知”而达“治国、平天下”),在整个循环过程中似乎仅仅是起点有所不同,但其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在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中,“治世”的目标未必符合“治国、平天下”的长期最优效果,“治世者”往往也不具有长期关怀动机和能力,由此推知“治学”也必然以“治学者”所处环境下的目标认知为出发点,急于求成,而失却对学术的反哺。^①反之,如果以人类本能的求知欲作为驱动力,单纯追求“格物、致知”(讲求形式逻辑并注重公理体系),虽然在短期内似乎脱离现实、满足于“自我欣赏”,但史实证明其对于人类知识体系的扩展效果是极为巨大的,对于“治世”的效果提升也同样非常显著。

第四,实用主义研究成果的相对无效性。

^① 国内问题层出不穷,而我们却总是不得不从国外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支持,即为此鲜明写照。同时,将学术研究等同为对策规划,就如同将教育简化为职业培训一样不可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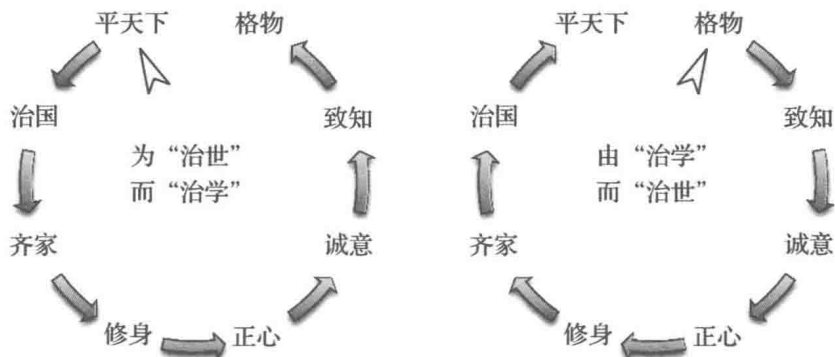


图2 从不同节点出发,结果大不相同

相对于实用主义经济学的实际成效,若推行反实用主义学术观^①,对于实用主义本身所追求的“治世”目标的达成,反而具有更高的有效性。换言之,非实用主义经济学具有更高的实践价值。

在中国,实用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厚重基础即在于推行四十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体制下,由政府总揽经济全局,全权决定生产结构、投入产出及分配格局。如此,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完全的可操控性、利益格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此时经济学研究对于其研究对象存在一种可谓“拟人化”的倾向:即将国民经济系统视为单一行为主体,认为其对于外部刺激可以产生直接而可测的反应。^②但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利益格局开始分化,各类主体的行为机制逐渐多元化,经济运行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以监测和控制。^③而以对策产出为宗旨的实用主义经济学基本立足于政府立场,仍延续了传统的“拟人化”思维定式,将“经济”、“社会”、“产业”等本是出于研究便利和统计便利而设定的纯理论概念和统计概念,视为既定的单一行为主体而欲指点江山、予取予求,全然无视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实用主义经济学派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天然联结,必然导致其先天基因缺陷与后天发育不良;由此虽然高产对策,但此类对策的可行性、合理性、有效性都

^① 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学术本位主义,而为更一般化考虑,此处称之为“非实用主义”。

^② 这也正是哈耶克针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定义乃至批判的“集体主义”倾向。

^③ 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某些施政者也从未对经济运行机制有所真正了解,更奢谈有效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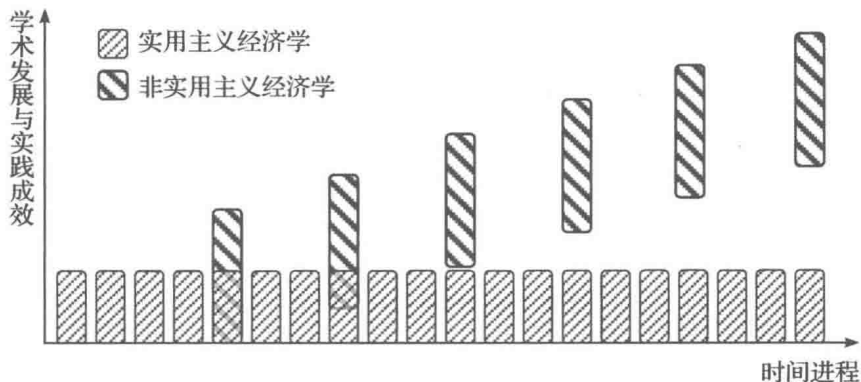
无以保障,名为解决现实问题,实则往往只是增加政策干扰。^①

与之相反,不以“有用”为显性目的的非实用主义经济学则以对现实的观察为出发点,以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为直接目标。既然不追求对现实问题的即时解决,不囿于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非实用主义经济学仅仅是关注于问题分析和观点论证的系统性和严谨性,由此要求更充分的资料搜集、更深刻的文献批判、更严密的理论建构和更可靠的经验证伪;基于此,遵循不断对前人研究进行批判继承的学术发展路径,经济学研究实现了学科内部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并建立起近乎自然科学的日益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与研究方法体系。虽然经济学在其科学化发展的道路上一直受到质疑和批判,在国内更是有两种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竞争,但(主流)经济学仍然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体系中成熟度最高的一门学科。反观实用主义导向的经济学,其基础研究(包括方法论研究和纯粹理论研究)长期受到忽视,对策研究数量虽然蔚为壮观,但多数偏重于经验直觉,学科体系从未真正成形。

仍以前文提及的学术附加值概念来分析实用主义经济学与非实用主义经济学二者的功效。实用主义经济学以现实需求为直接出发点,强调以社会需求(尤其是政府需求)为导向的短期、可视化效果,但其研究成果(具体的对策规划)不考虑跨期、跨领域的适用性,无济于学术附加值的积累,对策效果也大多只能达到在某一较低水平。与之相比,非实用主义经济学虽然直观上低产而且“缓不济急”,但有助于发掘单项研究的学术附加值,研究成果的普适性更强;更为关键的则是前后项研究之间必然以创新为动力,以批判、扬弃、传承为主要论述内容,学术附加值因而得以渐次提升。进一步,学术附加值与其实践成效之间又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学术附加值的积累过程必然体现为对于经济现实了解程度的加深、理论工具的多样化、分析方法的有效性等多方面成果,这些又会在解决实践问题中产生更大成效,可以更好地满足对策规划的长期性、整体性优化目标。

综上所述,由于实用主义经济学研究旨在满足外部需求,而外部需求主体多非学术共同体成员,他们不能为学术发展提供充分而有益的评鉴信息,多元化的“知识”诉求反而增加对学术发展路径的干扰;在受众群体(从而外部需求)极大扩张的同时,为弥补供需缺口,学术研究的生产周期被迫不断缩短,学术产品的质量水准也主动下降——主要体现为淡化抽象理论、回避思辨过程、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用主义学者们从未准备要为自己提出的无效对策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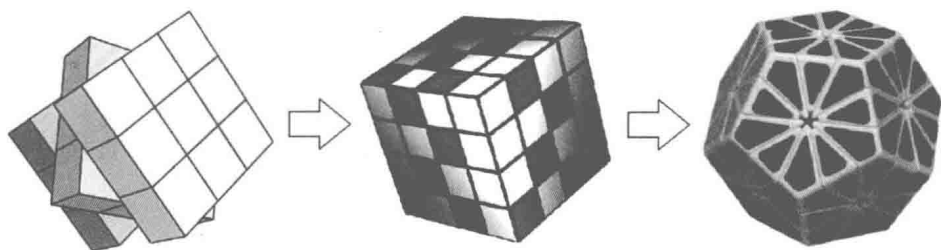


图4 魔方的进阶与异型化

实际上,转动魔方对于腕部不适未必能产生显性的缓解作用,但笔者却从中产生了与写作本篇序言相关的别样联想。如果将魔方比之以以经济学研究所致力于解决其各方面问题的社会经济系统,魔方的各面、各层、各种色块可视为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行为主体),而转动魔方者则相当于完全指令经济下的中央计划者。当各面皆还原为同色时,各部门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同时实现,社会经济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从技术层面考虑,这当然有其难度,需要对其空间结构做系统勘察和精密计算;倘若中央计划者对于魔方(社会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感到无从驾驭,开始征集“专家”们的操作建议,此时政府对于学术界的“实用主义”需求也就随之产生了。此处需要思考的是,面对魔方还原这一现实(“实用性”)需求,哪种对策生成路径更为有效?

设想一下,在实用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各路(有评价话语权和资源配置权的)利益相关者开始纷纷表达对于学术研究的“有用”诉求时,就好比急于要求将魔方的各面都以最快速度还原一样,往往可能会顾此失彼、欲速不达;如果学者急于为某一面的还原“献计献策”,却未必能顾及其他面的混乱性,最终造成仅为某一利益集团“谋利”的结果。如此一来,魔方的世界喧嚣不止,却总是难如众人所愿而同时全部还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部分学者偏好于钻研魔方的内部结构与空间格局(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客观运行机制),甚至于转向研究多维空间的数学问题;这些虽然看似与实际应用无关,但就达成最终目标所花费的人力和时间而言,未必会比“一拥而上”方式消耗得更多,还可生成大量系统的学科知识以供传承,可谓学用兼顾、一举两得。最终,潜心数学者推导出魔方还原的可行解法,而直言要解决魔方问题的对策研究却始终呈现众说纷纭的乱象,固然热闹(丰产对策),却无法提供可靠的、有效的解决方案,终归无济于事。

四

至此,笔者似有必要就如何推动非实用主义经济学研究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也即为反对策(研究)而所需的对策。考虑到实用主义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培育土壤和发展环境,若要伸张与实用主义完全相悖的学术本位主义,必当寻求制度化的突破路径;而由于制度环境一时难以改变,对于学者个体而言,则首先需要建立有效的自我协调与应对机制。^①

第一,稀缺的时间资源如何有效分配?

为了追求学术产出(价值)的最大化目标,学者个体必须有意地对各种彼此冲突的评价标准进行自我协调,并对不同评价体系所重视的各类可用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一方面,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莫过于时间,没有充足并且连贯的时间保障,阅读就不能广泛,观察就无法细致,思考就难以深入,推理就失却严谨;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资源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经济事实的考察和求证过程尤其如此,但对于这些资源的竞争过程又势必会对学术研究最为依赖的时间资源发生挤占。在实用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之下,经济与社会资源大量涌入学术领地,由此产生的突出问题是,学者们应该如何将有限的时间在直接学术研究与社会资源争取二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果对此做投入产出分析,可将学术研究中学者的时间(精力)分配模式及其效果予以充分展现。

为了考察和分析此问题,需要对学术研究过程中时间资源和经济社会资源的(边际)生产率加以分析。首先,将学术产出价值(A)表达为时间投入与社会资源投入的函数:

$$A=f(\text{time}, \text{resource}) \quad (1)$$

同时,辅助于学术研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获取也是时间的函数:

$$\text{resource}=r(\text{time}')=r(1-\text{time}) \quad (2)$$

其中假定将时间禀赋(不妨设为1)中学术投入以外的时间部分全部用于对社会资源的争取。因此,最终可以将学术产出价值表达为以时间投入作为唯一

^① 遗憾的是,这里所谓的“自我协调与应对”距离真正有效的非实用主义对策措施仍然相去甚远。